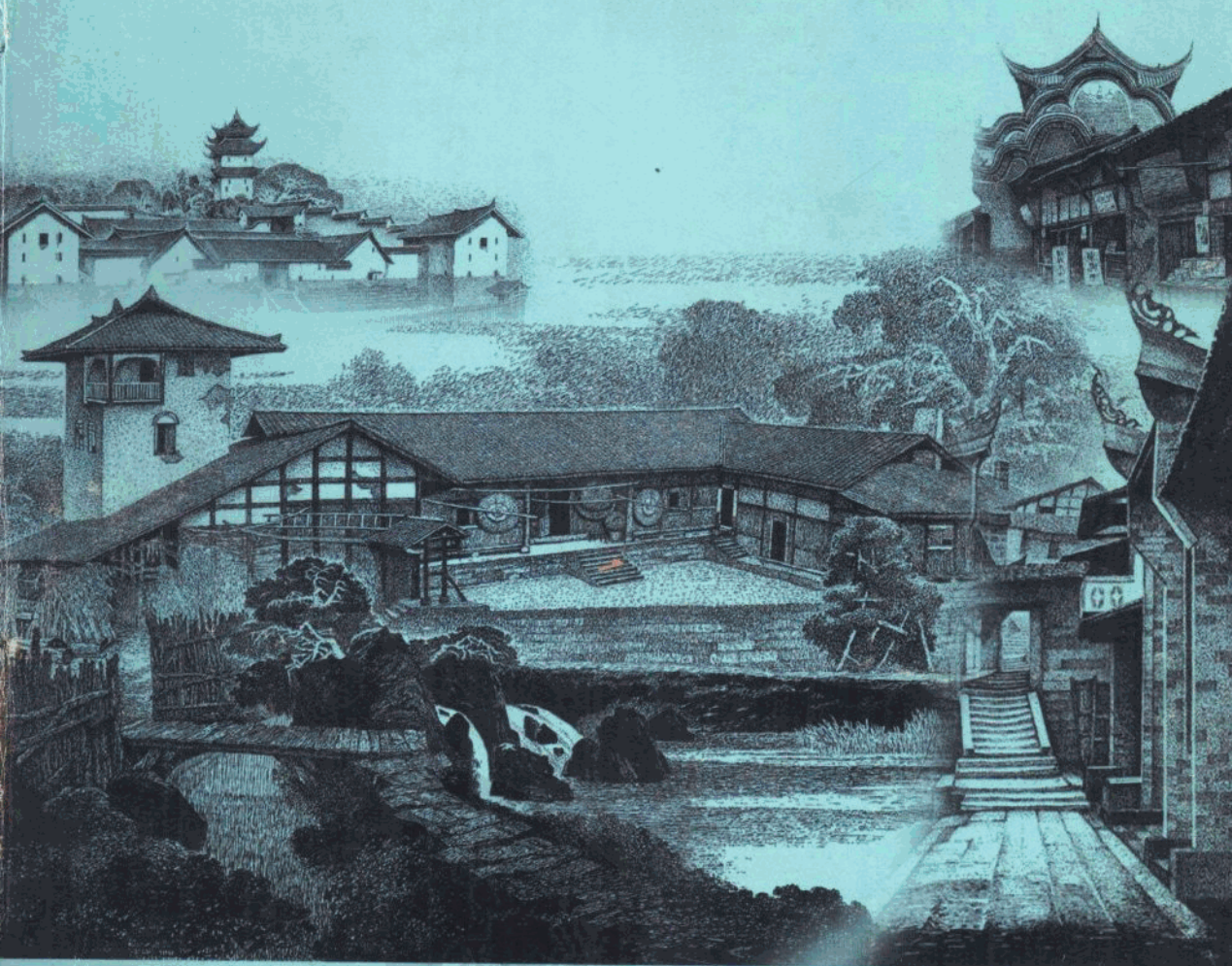


四川与客家世界

第七届中国客家学研讨会

论文汇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
国际客家学会(香港)

中国·成都
2001.3

第七届中国客家学研讨会

组 织 机 构

主办单位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国际客家学会（香港）

协办单位

香港崇正总会

岭南大学族群与海外华人经济研究部

四川客家海外联谊会

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文化部华夏文化促进会客家研究所

承办单位

四川客家研究中心

学术指导委员会

名誉主任：李达昌 黄石华

主 任：郑赤琰 刘茂才 李绍明 邱 林 陈世松

秘 书 长：陈世松（兼）

目 录

客家研究综述

21 世纪文化的冲突与客家文化的发展	张卫东 (1)
激进与保守之间——试论客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取向	葛文清 (6)
略论客家的农耕文明	江俊龙 (12)
客家学研究方法简论	崔 灿 (16)
从布劳岱尔的时段理论探讨客家现象	朱荣彬 (20)
四川客家研究评述——兼论客家民系形成问题	刘义章 (21)
论四川客家研究的潜在价值	陈世松 (22)
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志与客家学中的惠州	严忠明 许志晖 (28)
近代西人对客家的认识与研究	钟佳华 (33)
客家人与韩国人的文化观念比较 (摘要)	文智成 (34)
从“客从何来”到“何以为客”——浅谈客家学术研究史中范式的转变	张 侃 (35)
建议一个适合时代的客家人新定义	钟嘉谋 (36)
客家妇女为什么那么勤劳	希尔盖茨 (41)
客家妇女与文学	罗可群 (42)

客家移民与四川

客家与“湖广填四川”	钟德彪 马卡丹 (43)
闽粤赣等省客家与四川	黄马金 (47)
明清时期四川的赣客移民	万芳珍 (52)
清代前期闽粤赣客家人移垦川陕成因考证	陈良学 (62)
“湖广填四川”中的广东长乐客家人	刘佐泉 (73)
论客家与清代四川移民	丘权政 周玉兰 (74)
清代闽粤赣移民在四川的分布及成因 (摘要)	蓝 勇 (75)
清廷移民四川政策的演变——兼论客家移民在川的分布	宋 超 (77)
赣人与西部开发的渊源流变	许怀林 (78)
清前期客家人西进移民四川的历史地位	孙晓芬 (83)
清代四川地区玉米红薯的传播、种植与客家人的贡献	李映发 (91)
客家人对四川印刷出版业的重要贡献	王 纲 (99)
清代四川客家人农业经营状况初探	张学君 (106)
古镇洛带客家的来源与形成	刘世旭 周久华 (107)

成都近郊客家方言区五十年前后简况	成华区文化广播电视局 (113)
下川南地区客家初考	王 成 任德清 (119)
四川自贡胡慎怡堂客家源流探析	胡昭曦 (124)
也谈客家精神——以刘秀标入川为例	罗朝祥 刘善群 (执笔) (132)
“廖广东”与廖氏客家人入蜀琐记	王 炎 (135)
“湖广填四川”及其它——田野调查笔记	孙和平 (138)

客家社会组织与族群关系

四川客家会馆的社区功能	黄友良 (142)
四川的客家会馆	冯树盛 (151)
从宗族关系看清代台湾与四川移民社会之转型	刘正刚 (155)
过番、移居与族群社会建构——华南地带客家的迁徙及组织之研究	黄子尧 (161)
水客：一个华侨史、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客家地区的历史考察	周建新 (162)
淡水鄞山寺与台湾的汀州客家移民	杨彦杰 (168)
客家文化与畬族文化的关系——以客家神明和“黑狗公王”的关系为例	钟晋兰 (178)
从客家文化的多元因素看汉、畬民族交融	罗 勇 (185)
台湾客家与其它族群之互动关系	吴中杰 (186)
传统村落视野下小姓弱房的生存形态——闽西武北客家村落的田野调查研究	刘大可 (190)
深圳客家宗族派衍与传统村落拓展	刘丽川 (204)
妖魔化客家——咸同年广东高明土客械斗研究	温春来 黄国信 (212)

客家文化传承与经济开发

试论客家文化在四川的传承	陈大雨 (218)
论四川客家对客家文化的传承与演变	张明兴 (221)
客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重教”传统（提要）	刘 敏 (232)
客家历史文化的传承方式——客家人“来自中原”说试析	郑德华 (233)
客家民系人文精神的传承	郭呈祥 陈晓燕 (234)
客家文化在西部旅游资源开发中的市场作用及其开发体系	郑向敏 谢朝武 (235)
再论客家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林晓平 (240)
发展客家文化优势 发展梅州旅游事业——试论将粤东古镇松口开发为“综合性旅游区”的可行性	梁德新 (241)
客家文化研究与当地经济文化建设紧密结合的思考（二）	李隆秀 李世文 (248)
客家文化研究与当地经济文化建设紧密结合的思考（三）——改变罗家湾落后状态的构想	姚秀林 刘家鼎 李培英 (252)
经济区域级差理论关照下的客家地区经济的发展	周 俐 (255)
一个客家迁徙中的典型实例——“怀远都”探奥之一	谢国纲 钟鸣时 (261)
客家迁徙与姓氏文化——“怀远都”探奥之二	谢国纲 吕宗旺 钟鸣时 (268)

客 家 人 物

胡文虎广告经营思想新探析	王予霞 (274)
熊德龙其人其事	古 进 (279)

刘光第与客家祖地闽西	苏钟生	吴福文 (283)
以身许国 血荐轩辕——刘光第从容就义与客家文化	蒋维明	(284)
论刘光第	刘华祝	(288)
记辛亥西昌首义客家志士张耀堂	李绍明	(289)
客家青年郭沫若与四川保路运动——读《反正前后》	韩信夫	(292)
新都客家及其人才群体	李义让	贺锡玉 (301)
联圣钟云舫对客家文化的贡献	钟永毅	(309)
谢绪岷与《菱舟诗稿》	赵长松	(312)
孙中山经济现代化思想与我国当今实践之比较研究	王洪友	(317)
邓演达与客家文化	殷丽萍	(318)
吴玉章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贡献和客家精神 (内容提要)	邱 涛	(322)
赤诚的爱国主义者丘念台	李鸿生	(323)
燕赵之风与客家志士	吴建华	(328)

客家与港台及海外华人社会

客家人与海峡两岸关系	叶 扬	(333)
客家和海外华人社会	赖绍祥	(339)
客属足迹环球——客家与华侨华人源流情论	罗英祥	(346)
台湾客家人的“中原意识”与“台湾意识”(论文提要)	叶进华	(353)
客家村落与环境保育：香港个案	张展鸿	(354)
客家与台湾	王志光	(355)

客家民俗与文化艺术

四川竹枝词客家文化史料研究	王子今	(356)
四川谚语探微	廖 军	思 维 (364)
成都东山民俗探源	江玉祥	(371)
粤北客家文化概述	曾汉祥	(272)
赣南客家灯彩	张嗣介	(375)
客家擂茶源流小考	刘劲峰	(381)
客家人的妈祖信仰——以新竹县为例	范明煊	(384)
客语辞典有音无字的查考	杨清治	(390)
民间信仰：认知客家传统社会的新视野	宋德剑	(397)
北台湾中学客家文化教材评述	钟文钦	(403)
北台湾客家农谚与二十四节气运作的探讨	张瀚云	(410)
从梅县松口民间诸神资料看宗族族神的再造	房学嘉	(422)
论姓氏谱牒文化与炎黄子孙寻根问祖	傅昌志	(423)
赣南客家村围考察	万幼楠	(434)
试论南粤客家围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黄崇岳	杨耀林 (439)
浅谈地域文化之现代性——以东势匠寮聚落灾后复建案为例	邱裕文	(444)
从客家山歌看客家妇女(提纲)	张小莹	(447)

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本字考	刘纶鑫 (448)
客语与日语入声字的探讨初稿	杨镜汀 (455)
海陆客语字典编辑概要	詹益云 (465)
大埔客话在台湾——以台中县东势地区为例	徐登志 (473)
成都市郊客家聚居区十陵镇农村儿童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彭锦维 (477)
台湾平镇的“四海话”研究	邓盛有 (481)

21 世纪文化的冲突与客家文化的发展

张卫东

我们已经跨入了 21 世纪。21 世纪人类文化发展走向，的确令人关注。已经有许多人发表了意见；有些人虽然没有正面发表意见，但从他们处理某些事件的做法，也可以知道他们的立场。这些意见与看法，有的相近，有的相左，有的根本对立，纷呈杂陈，莫衷一是。这本是很正常的。今日之人类，较之上个世纪之交，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更大的自觉和自信去把握自己的未来。

21 世纪人类文化发展走向是全球化大趋势下的多元化。东方文化将面临西方文化的新一轮的冲击。客家文化将如何面对？如何在冲突中求得发展？这是客家人，也是客家学者要清醒认识、认真研讨的大问题。我们不能重开殖民主义时代以“文化孤立主义”对抗“文化霸权主义”的“文化保卫战”，而应该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心态与姿态，积极主动地吸纳他种文化的精华，从而发展自己文化。“海外”与“海内”的客家人以及客家文化学者所处的环境有所不同，任务也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要注意反对“文化孤立主义”，特别要警惕那种煽动狭隘民族主义、以“文化孤立主义”对抗所谓的“文化霸权主义”的倾向。

一、文化的全球化与多元化

1. 1 人类进入 21 世纪将身临一个怎样的文化环境？已有不少学者指出，是“文化的全球化与多元化”，即在文化全球化大趋势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我同意这种看法。但是，对于人类文化发展负有重大使命的学术界和各位学者来说，同一大趋势下的侧重点，东方跟西方会有所不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乃至不同学科也会有所不同。

1. 2 “文化的全球化与多元化”已成为一种大趋势，若欲充分认识这一点，先得回顾一下 20 世纪人类经历了怎样的一场百年纷争：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主义的瓦解与消亡，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与民族独立，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形成及其军事对垒、文化封锁，两大阵营在朝鲜半岛和越南等战场的交锋，“苏、东、波”的变革，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及其所属各国的先后开放改革，冷战结束……由人类自己制造的无数战争与浩劫无情地教训了人类，越来越多的人，由热衷于意识形态对抗转向理智务实的道路，越来越注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局部战争虽说仍不时发生，将来也还会有，但是，挑动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狂人和穷兵黩武的政策，再也难以获得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能力。“铁幕”拉开了，“柏林墙”推倒了，全球经济与科技一体化势不可当，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全球化，而“因特网”这可能是 20 世纪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象征，更让人类手拉手，让人类的心可以更加亲近，更便于相互接触与深入交流。个人活动的领域开阔了，世界的距离缩短了，“理解万岁！”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进步人类的共同呼声。殖民主义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跟专制独裁同样遭到人类的一致唾弃。

跟百年前比，我们这个星球仍然那么庞大，人口有了成倍的增长，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喜欢用“地球村”来形容全球的后殖民社会。这是为什么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有许多人已经意识到：20 世纪人类的苦难与牺牲，已经赢得了一个伟大的进步，不同种族、不同制度、不同信仰的人类，大家的共同利益、共同语言越来越多了，人与人的关系，有如一个世代和平相处的村庄的乡里乡亲，虽说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但其求繁荣与发展是主流。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21 世纪是全球文化大融合的时代。

1.3“全球化”“大融合”，不仅不排斥“多元化”，而且比以往更需要“多元化”。就以奥运会为例。作为体育竞技，是高度全球化的，而它的各项比赛项目，无不来自不同的文化；它的开幕式总是牵动全球亿万人民的心。为什么？大家都期待着借此了解主办国的文化，而主办国也总是想方设法竭尽全方向全世界展现自己富有特色的文化。如果每届开幕式都千篇一律，就没人看了。这就体现了全球化大趋势下人们对多元文化的期待。中国有句古语：“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说的是，人人都喜欢美味；对何谓美味也有大体一致的评价。这也就是说，从人的本性来看，人类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有其共同性。但是，一年365天，如果天天都是同一道菜，即使是再好的美味，也会味同嚼蜡。所以说，文化“全球化”和“多元化”是人类文化发展这一矛盾体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相互依存；没有“多元化”便无所谓“全球化”，没有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的“多元化”，就不会有不断进步的“全球化”。我们说“全球化”的时候已包含了“多元化”，说“多元化”的时候同样也隐含了“全球化”，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好截然分开。但在部分学者特别是东方学者中间，存在着某种隐忧：一说到“全球化”，似乎就意味着“多元化”的消失，意味着接受“文化侵略”。我们认为，“全球化”与“多元化”之间会有冲突，但不宜轻易指之为“文化侵略”，即如在座各位，本来都有各自的民族服装，可是今天都是西装革履，能说这是“文化侵略”的结果吗？文明，就是人类文化进步的积淀；盲目拒绝他人创造的文明，能算是一种“文明”态度吗？

二、如何认识全球化与多元化之间的冲突

2.1上个世纪，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可以借用一个较为通行的说法，即“后殖民阶段”；我们的思想也应该顺应这种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是，殖民主义肆虐了四五百年，许多人的思维已成定式，前瞻21世纪，仍然以这种思维定式而对已然变化了的现实面不知修正。我们认为，这是当前特别值得注意的倾向。这一倾向主要表现为：一，意识到文化全球化的不可避免，对于强势文化的迅速扩张深感忧虑，担心本民族文化抵挡不住处处可见的“文化侵略”；二，残存的政治独裁与文化专制主义，更是惊恐于自由民主文化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祭起了挟隘“民族主义”的大旗，推行“盲目排外”、“自我孤立”的愚民政策，逆历史潮流而动，以维护其寡头政治的一己私利。

2.2这两种表现，本质不同，前者是对人类文化史缺乏通达的认识，而后者却纯是出于政治私利；前者的幼稚，又往往被奸猾的后者所利用。在现实中，这种事例已不胜枚举。这是最需要警惕的。文化学者的任务，应该是帮助前者跟上时代的发展，揭露后者阻挡历史前进的真面目，保证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和更为自觉的进步。

2.3早期人类，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创造了多个文化中心：在东方，有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以释迦牟尼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在西方，有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文化，以犹太教先知为代表的希伯来文化，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非洲文化等。这些文化系统，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硕果，却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各自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历过与别种文化的交流与冲击，也都能证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冲击，是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巨大动力——尽管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中国文化，就是一例。中原大地上的不同种族与部落，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两千年政治经济上的征伐与思想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创造了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可以说，中国文化从它一开始就是“多元化”与“一体化”的对立统一体，是冲突与包容的结果；而中国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传统，也就是这么形成的。因此，当印度佛教传入之时，非但没有破坏中国固有文化，反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升华。可以说，中国文化获益于印度佛教，同时，印度佛教在中国得以发扬光大，其成就甚至远高于印度本土；这种更新了的中国佛教文化不仅催生了宋明理学即新儒学，而且还传到朝鲜与日本并使这两个民族的固有文化获得巨大进步。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地区创造的，只要是其他民族或地区的人民愿意接受和主动吸纳，就不能说是“文化侵略”。著名学者乐黛云教授说得对：“正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一个文化宝库，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而导致某种文化的革新。没有差异，就没有文化的多元发展，就不可能出现今天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1]

2.4如上所述，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全球化”和“多元化”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历史。

全球的多元文化,乃至各个民族内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并不是均衡发展的,总有“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别。世界上有过的和现存的多元文化中心,都曾在一定区域一定时期扮演过强势文化的角色,例如汉唐时代的华夏文化,例如十字军东征时代的罗马文化;也都曾在一定区域一定时期扮演过弱势文化的角色。今天的东方,由于政治、经济、科技的落后,无庸讳言,其文化成为公认的弱势文化。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在东方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危机感,担心他种文化的“侵略”与“冲击”,于是有人准备以祖辈对付殖民侵略的旧法来打一场新的“文化保卫战”。这种心态与姿态,是很值得反省的。

2.5 客家文化亦是如此。一千五百年前,客家先民离开黄河母亲抵达江淮地区开创新家园,那时他们代表了先进的中原儒文化,他们并没有拒绝而是汲取了长江流域吴楚文化的营养,不仅使汉族正统政权在长江立足,而且促成了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腾飞,使江淮地区成为全国最为发达的“首善之区”,使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格局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为盛唐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客家先民于唐末继续南迁时,又是带着更为先进更为强盛的长江文化进入江西、福建和广东的,不仅为华南地区的开拓注入巨大力量,更在大量吸纳华南文化的基础上促成了客家民系的降生和客家文化的脱颖而出。随着清末大量客家人到海外谋生,当时海外一些新风新文化便不断传回客家地区,获得民主思潮滋润的客家文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西风东渐”大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股。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之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得力于这股力量。近代史上对客家人与客家文化污蔑与围剿的多次发生并酿成一波又一波的社会风潮,究其实质,不过是封建传统文化和某些政治势力对客家文化中民主意识的反扑。这些反扑未能扼杀客家文化,反而使它声誉大振,使海内外学界刮目相看,进而催生了“客家研究”乃至“客家学”。客家文化,就是一种既努力保持固有优良传统、又不断吸纳外界新文化素养的文化。展望21世纪,它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向前发展。固守传统,拒绝纳新,采取“文化孤立主义”,是文化上的“蠢猪政策”。客家文化从来没有那么“蠢”过,今后也不会那么“蠢”。

2.6 有学者指出,全球化与多元化进程中存在两种危险,即“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面对危险,当然应当有所警惕与预防;现实的“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敌人,都不可取,都要反对;然而,强势文化一边的学者应主要警惕“文化霸权主义”,弱势文化一边的学者应主要预防“文化孤立主义”,侧重点各有不同;尤不可取的是以“文化孤立主义”反对“文化霸权主义”。

三、我看新世纪客家文化学者的任务

3.1 中国清朝晚期,从朝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到民间的“义和团”,都是以“文化孤立主义”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其结果如何?不仅被西太后用来扼杀了光绪的改良计划,而且导致盲目排外的“文化孤立主义”横行无忌。而同时代的日本,则以积极吸纳的心态与姿态,开展了“明治维新”,让一个东方弱国强盛起来。这两种结果是有目共睹的。这是宏观的例子。从微观方面看,亦是如此:三四十年代,中日两国爵士乐水平相当。四九年后,中国大陆以“西方文化”“靡靡之音”为由予以禁止,而日本则将自己的音乐与文化融入了爵士乐,日本爵士乐“返销”欧美,曾经大行其道。“文化孤立主义”使中国人丧失了为发展爵士乐文化作贡献的机会。“文化孤立主义”的结果就是文化的自我葬送。以“文化孤立主义”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从来就是愚蠢的错误的。我认为,在今日中国,必须警惕与反对“文化孤立主义”。

3.2 “文化孤立主义”往往是专制政治对抗人类共同文明的“法宝”。“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口号是“反对封资修”。“反封”,割断了自己三千年的文明传统;“反资”,封锁了世界另一半人民所创造的新文化;“反修”,扼杀了社会主义阵营开放改革弃旧图新的初次尝试。所以,“文革”就是割断历史、对内对外全面隔绝的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文化大革命”不仅导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更使固有文化传统遭到空前破坏,使中国文化濒临崩溃边缘。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剖析与研究仍遭禁制,文化孤立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幽灵仍在中国上空游荡,以“文化孤立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悲剧与闹剧仍在不断地重演,近来更有变本加厉之势。这是中国文化目前的悲哀。但是,我们是乐观的,因为,经历过“文革”浩劫,“文化孤立

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已经日益不得人心。“文化孤立主义”彻底破产之日，就是中国文化回归人类文化发展主流之时。中国文化，包括客家文化，向来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今天更应该发扬这种包容性，敞开博大胸怀，迎接世界文化主流的“冲击”。“沉舟侧畔千帆过，不废江河万古流。”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有如“沉舟”，它无法阻挡“千帆”争流的“多元化”，更无法阻挡万古奔流的“文化全球化”。中国文化一旦恢复了自由发展的天地，中华文化必能再创辉煌，为全人类的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3.3 关于文化的包容性，再看中国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客家文化，另一个是满族文化。论者已经多次论证，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分支，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特征。它是西晋末年逐步辗转南迁的中原汉人到闽粤赣山区以后形成的民系。他们以汉族正统自居，重视文教，以儒学排读文化为传统。初到华南，他们代表着“中原强势文化”。在语言方面，其祖训是“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清初迁入四川的客家人，离开广东祖地三百年了，其方言竟然没有明显改变；今日客家人分布于全国十余个省区而方言内部的一致性却比其他各大方言都强，正反映了客家文化中存在维护固有传统的强烈意识。客家文化也有很强的包容性，无论是在富庶的长江中下游，还是贫瘠闭塞的闽粤赣山区，对于原著民及其文化都多有吸收与融合。尤其是到了海外的客家人，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学习并吸纳他种文化，并进而有所创造，因而更具活力更有实力，作为一种文化，发展得更好。所以，“客家文化”不等于“中原文化”，是客家先民及其后人以中原儒学为本大量吸纳他种文化而创造的一种新文化。相信在未来的新世纪，客家文化仍然会沿着它的传统路线不断发展与更新，并且相信再过一百年，他们也还会像今天这样非常自豪地向世人宣告：“我系客家人！”客家文化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点：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虚心学习与吸纳他种文化的优秀的先进的成分，就可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强势文化会更强，弱势也可以变为强势。否则，强势文化也会被历史淘汰。眼前就有个现成的例子：

满族文化即将失落

据2000年11月6日《黑龙江日报》报道：黑龙江省内外史学界、社会科学界及满语文化界的专家，日前在哈尔滨市举行“寻找失落的文明座谈会”，共同就哈尔滨电视台发现的遗落在民间的有关满族移民的档案《拉林阿拉楚喀京旗原案》一书进行探讨，同时呼吁抢救即将失落的满族文化。

经有关专家鉴定，这是一本嘉庆年间的官方档案，档案记载了255年前，也就是乾隆9年至乾隆24年间（1744—1759），京旗满人移居哈尔滨的阿城、拉林等地的过程，证明了哈尔滨的历史不是从近百年才开始的，它有着更久远的历史。同时，这本书的发现对研究黑龙江省的移民史、农业史和文化史有着独一无二的史料价值。

与会专家们认为，哈尔滨市及阿什河流域存留着大量的满族文化和历史。他们呼吁，要立即抢救即将失落的满族历史文化，古为今用，形成哈尔滨独有的旅游文化氛围。这对发展具有龙江特色的旅游业，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三百多年前，满族靠着军事“强势”入主中原，清政府统一中国的时候，政治、经济、军事上占尽了优势，并借助这种优势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强迫各族人民“改服梳辫说满语”。但是，它的文化毕竟是落后的，加上“八旗子弟”只讲吃喝玩乐，不思上进，不久即开始让被统治的汉族文化同化了，而今终于宣告即将“失落”。可见，“文化霸权主义”并不可怕，它可以得逞于一时，但不能坚持于永远，落后的东西终究要“失落”。

3.4 再看看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居韩国。韩国政治经济已经基本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在“全球一体化”方面，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早二三十年，而在文化建设方面，特别是新闻、结社和学术自由方面，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有一次，陪同一位台湾教授参观景福宫和韩国民俗博物馆。参观出来，他深有感触地说：“台湾是有钱没文化，韩国是既有钱又有文化”。我在韩国住了一年，对韩国文化略有所知。我很同意这位台湾教授的看法。朝鲜时代对抗清朝的“文化霸权主义”，斗得比中国汉族还英勇^[2]；日据时代对抗日本的“文化霸权主义”，更是出色。大韩民族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是有经验有传统的。韩战以来近半个世纪，一直保有对“文化霸权主义”的警惕，同时不堕入“文化孤

立主义”的泥沼。来过韩国的人都会有强烈印象：他们既十分细心地保持与传承固有文化传统，又不自外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这是他们经济腾飞的力量源泉。到过中国的教授不少人都在这里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师道尊严”，体验到有序的教育如何为这个曾被炸弹夷为平地的国家的崛起准备了大量高素质的人才。为了民主与进步，他们的大学生与市民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其悲壮激烈，确实可歌可泣又卓有成效。庄严肃穆的光州 5. 18 烈士陵园和对两个前总统的严正审判，都是在提醒全民族：“不讲真相，忘记过去，不幸的历史就会重演”（History which does not speak the truth, and does not remember the past, is bound to be repeated.）^{〔3〕}。在我们这里何时才能形成这一共识呢？许多历史问题，不讲真相，不去研究，满足于“已有结论”，结果是“不幸的历史”不断重演，这样的文化科学吗？可取吗？客家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特别是近五十年的历史，许多重大事件，许多沉痛教训，都还没有深入研究，甚至真相都还远未搞清楚，却一味地强调“向前看”。看什么？怎么看？个人认为，这个时候倒是应该平心静气地看看进步与发达国家是怎么研究和推动自己文化的发展的。他们的经验，可以让人相信：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甚至猛烈冲击，从而优势互补相互融合，造就更高层次的文化，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则；对于不同文化，健康正确的心态，不是一味地禁止、对抗，而应该因势利导，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用以丰富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使之随着世界进步潮流不断创造、转化、升华，才谈得上进而对人类文化的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3. 5 中华民族，特别是客家人，向以全力维护自己固有文化传统而著称于世。其共同之处，就在于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具有信心。19、20 世纪西方列强文化没能“吃掉”东方文化，21 世纪的更为自觉的东方人，面对西方文化新一轮的冲击，更不必盲目害怕。我们应该而且可以以更加冷静的积极的心态，作好三个方面的研究：（一）上一轮冲击中的经验与教训；（二）对我们固有文化的重新认识；（三）对今日西方文化的科学分析。这三点是相互联系的。有学者说得好：“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4〕}就是说，在文化问题上，对人对己都要以科学的态度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不要自断传统，不要盲目排外，不要自我孤立，不要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要搞新的“闭关锁国”。“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是今日西方文化的主流，也早已写进我们的宪法。过去我们是举起左手打倒传统文化，举起右手打倒境外文化，对所谓“封资修”都不能“一分为二”，结果是信仰危机，腐败丛生，道德沉沦……“反对西化”已近百年，可许多人对“西方文化”为何物并不知情，尤其是对它的精髓“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仅不懂，尚且有种莫名的恐惧，更有一些人在制造或散布这种恐识。应该从这种盲目与恐惧中跳出来了！面对即将到来的“全球化”“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大潮，我们应有的心态与姿态，可以用一则富于哲理的古训来形容，这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3. 6 具体来讲，海外客家比国内客家发展得好，东南沿海的客家比内陆客家发展得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发展得好的客家社区，他们的外界环境与内在条件有什么特点？有哪些经验教训？相对落后的社区可否借鉴？借鉴什么？如何在发扬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力吸纳他人的不论东西方的优秀文化从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要科学地准确地毫不含糊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客家文化学者就要学习许多东西，要做许多调查与比较研究，还要敢于面对现实，要勇于说真话。若能如此，客家学才能为客家地区的振兴与发展略尽绵薄，客家学自身也才能逐渐发展成为无愧新世纪新时代的“显学”。

附注：

〔1〕 乐黛云：《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化多元化》《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 年第一期。

〔2〕 参见吴庆元 [朝鲜 1833 年]《小华外史》。

〔3〕 光州 5. 18 烈士陵园历史馆主题碑。

〔4〕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作者为深圳大学教授，深圳客家研究学会会长。

激进与保守之间

——试论客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取向

葛文清

使用“激进”、“保守”这个分析工具来探索客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文化层面上的激进与保守，指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这主要取决于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主张全盘推倒传统文化的即为激进，而文化阐释仍然固守在本土文化框架内的是为保守。现代化进程中的客家传统文化取向很独特，一方面客家民系积极取法西方激进主义文化，富于革命改革的精神，欧美日本学者甚至得出“中国革命是客家革命”、“中国革命是客家人的事业”^{〔1〕}；另一方面客家民系又特别注重维护传统，保持固有的语言风俗，讲究礼仪规矩，表现出强烈的保守倾向。客家传统文化正是沿着这两条路径走向现代的。在这个过程中，客家传统文化不断作出适应和转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化。换句话说，这种激进与保守共存的文化取向本身已经成为客家文化在现代的重要特征和内容。客家民系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独特的文化风貌？这种文化风貌的内涵特征是什么？这种文化风貌与现代化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样的视角研究客家传统文化似乎还不多，本文将客家传统文化的变迁置于现代化的背景之下进行分析，以期抛砖引玉，就正于方家。

一、客家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本取向和历程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实践难题，也是现代学术研究中一直存在重大争论的理论难题。一方面，现代化是全球的同质文明，另一方面，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的人文背景，这些不同的人文背景也即是传统文化背景。

现代不是与过去相对应的时间概念，而是指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型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现代社会是由现代性因素构成的社会，现代化过程就是现代性因素不断取代传统性因素的过程，是社会各领域的结构变迁，主要包括下述方面：（1）国家和民族的形成，政治民主化以及相关的政治合法化基础的变化，如社会福利保障和财富的政治性再分配。（2）内源性的经济持续增长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由农业到工业化，最后进入第三产业主导的社会。（3）城市化，大众通讯传播的发展带来了社会成员的流动性提高。（4）文化的世俗化，道德意识的普遍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世界观的理性化。（5）自我认同越来越转向个人的成就，而不是与传统生活方式的统一。^{〔2〕}这些现代性因素是在西欧和北美的文化土壤上产生的，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成果，这些现代性的因素后来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变迁过程，而对于西欧北美以外的其他国家而言是一种与传统文化没有必然联系的外部强制的取代过程。所以，现代化由于启动条件不同又可以分为内源性现代化和外源性现代化两种类型。西欧和北美国家的现代化源于社会内部，它自身的因素蕴育了现代化的动力，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就是内源性的现代化；而对其他国家来说，现代化的动力不再来自内部，而是主要来自外部的压力，即在早期现代化国家的压力下不可逆转地走上现代化，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就是外源性的现代化，外源性现代化也就是强制型现代化^{〔3〕}。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外源性现代化，这种类型的现代化的一个分配问题是如何对待固有的传统文化。由于现代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最高诉求，又由于外源性现代化并非是在本土传统文化土壤上源于内部自身的社会经济人文演变而来的，所以外源性现代化国家的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往往就会按照现代化的价值体系来决定，传统文化的取舍往往按照是现代化的动力还是阻力，是现代化的资源还是负担这一价值标准来决定。认为传统文化会成为现代化的阻力负担，人们就往往采取激

进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进而取法西方国家文化即全盘西化,认为传统文化的价值高于西方国家文化的价值,成为现代化的资源和动力,人们就会对传统文化采取保留保守的态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价值体系在衡量取舍的,基本走向是采取越来越激进的态度。这个历程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周知的。中英鸦片战争之后,便有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到19世纪下半叶则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的“自强运动”,有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有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主张君主立宪,甚至包括“清末新政”,也明显表现出取法西方制度。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的民国,传统政治秩序解体。到五四运动,以引进“民主”、“科学”为主流,彻底批判传统文化,积极输入西方文化。至此,中华传统文化受到全盘否定,经过土地改革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缘宗法社会关系的基础也解体了。可以说,自19世纪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国主流社会基本上是采取激进主义态度的。

以上是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基本走势。但是中华传统文化有丰富的内涵,有时序性、层次性的特征,其地域性甚至还包括海外的华人圈。在某些层次和某些领域,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与上述趋势有所不同。客家人是汉民族的一个民系,客家文化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客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整体趋向有所不同。

客家传统文化恰恰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特性的。客家民系对客家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取向采取是激进与保守结合的态度。一方面,18世纪以来客家民系从整体文化风貌上来说是有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是激进主义的态度,如客家人罗芳伯早在18世纪即在北婆罗洲的坤甸以客家人为主体建立了“兰芳公司”。这个“公司”成立于1777年,在1886年被荷兰殖民公司吞并,前后历时108年,是一个自治性的组织,有明显的近代民主的共和政体雏型,首领称大唐总长,前后有10人担任。“兰芳公司”显然是受到西方殖民公司的影响而采取的名称,裁判厅类似西方的司法机构;征税金也有近税则的模式;这个公司后来被梁启超、罗香林等学者誉为东方第一个共和国,尽管是否属于共和国有些学者提出了异议,但无论“公司”的名称还是内部管理机构,受西方早期殖民公司的影响启发则是无疑的。19世纪叶叶的太平天国运动,主要领导人和早期的军队主体都是客家人,从其名称来看,太平即中国经典中的太平盛世、天国来源于基督教的理念,本身也是中西文化合璧的产物,客家人洪秀全同样是借用了基督教宗教的外衣和仪式从事革命活动,太平天国后期的《资政新论》,包括了从经济技术到政治体制、社会习俗诸方面全面推进现代化的方案,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幅蓝图。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也主要是在客家聚居区开展起来,“苏维埃”意为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形式。这些事例说明,客家民系在现代进程中对西方文化采取激进主义的态度,这方面甚至有领先性,从总的趋势来看,客家传统文化吸收了民主化、科学化、市场化的现代性因素。^[4]

但是另一方面,客家民系又极其强调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特色,维护传统,固守客家方言和民俗。可以说,客家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恰恰是在现代化进程通过不断总结和阐释才逐渐完善的,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与其他不同文化的比照中完善的。客家人维护传统的秉性也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突现和强化的。显现了客家人强烈的文化保守主义风貌。客家传统文化现代化历程,至少造成了这些后果。其一是强化了客家人是汉人,是华人的强烈的文化观念;其二是强化了客家人对中华传统文化认同的观念,其三是强化了客家人对文化载体的方言和民俗的认同。^[5]

二、现代社会的客家文化基本风貌和特征

在现代化进程中,客家人突出文化问题,采取激进与保守结合的文化取向态度,造成了今天客家文化在现代世界的景观。但是,我们所见到的今天的客家文化并非客家传统文化。我们通常所说的客家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都是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对于今天已生活在实现了现代化或正在实现现代化社会的客家人和非客家人来说,都已经变得不再是耳熟能详,甚至有些陌生了。客家传统文化是在客家人接受现代化以前的文化,其中既有对中原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对南方聚居地土著特别是畲

瑶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与融合,而且因客家人在历史上经多次迁移而形成的“小聚居,大分散”的分布格局,使得客家传统文化形成了许多鲜明的特征,对于这些特征,我们一般概括为五种:其一是移垦社会的文化形态;其二是较强的宗族观念;其三是浓厚的崇文重教风气;其四是客家妇女的能力和地位;其五是讲客家话、唱客家山歌的方言特征。客家传统文化的这五项特征,在客家传统社会里,是通过客家人的日常生产生活、民情风俗、民间信仰、社会组织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比如较强的宗族观念,主要是通过土楼、围龙屋的聚族而居的形成、二次葬的习俗、重视族谱修撰表现出来的;崇文重教的风气则是通过各种家庭普遍设立私塾,把文化教育放在首要地位,以兴学为乐,以读书为本,以文章为贵,以知识为荣的客家社会风气上;客家妇女的能力和地位则主要表现为在普遍盛行缠足风俗的中国古代社会,客家妇女基本上不缠足,客家传统社会不再按照“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而是男子外出工商,甚至飘洋过海远走南洋,家庭担子由女子一肩承当,女子成为家庭内外一把手,客家话“四头四尾(家头教尾、灶头锅尾、园头地尾、针头线尾)个事”。真正起半边天的作用,显得客家妇女在社会上家庭中的显赫地位。妇女与男子平起平坐。而讲客家话,唱客家山歌则成为客家人重要的认同标志,“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宁卖祖宗坑,不卖祖宗声”。成为客家传统社会口耳相传的祖训,反映的是客家人在方言上的极度保守性^[6]。但是,今天的客家人已分布更广泛,根据历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有关资料统计,客家人总数超过6000万,分布在世界上8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时光一代代的流逝,特别是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那些生活在中国大陆、港台以外的客家人,所经历的是不同于原乡文化的经验。即使是中国大陆和港台的客家地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客家传统社会也全面走向解体,客家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事象都在流失,比如在民居建筑方面,传统的土楼、围龙屋已不再是客家人主要的民居形式。香港、台湾、深圳等地区的客家人的围龙屋所剩无几,多被辟为文物保护单位;而粤东客家民间大规模营造围龙屋从1950年起就停建了。在闽西,据笔者调查,闻名于世的永定土圆楼年代最近的一幢建于1979年,至今也未见有再建圆土楼的现象。钢筋水泥的居民逐渐取代了生土建筑。客家人独特的二次葬习俗也随着火葬的推广而逐渐消失,客家妇女不缠足的特殊风俗也因“五四”运动之后放足之风遍及中国各地而不再特殊;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知识体系已为现代的自学科学、社会人文科学知识体系所取代;热情好客的古风也逐渐为现代通行的礼仪所取代。这正是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客家人由于生活在不同于传统乃至不同于中国原乡的文化国度,由于生活在现代化的不同坐标上,客家文化不再是客家人唯一的安身立命的文化,甚至也不再是客家人生活地区的主流文化。但是作为客家人仍然拥有共同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这些文化传统仍然被带动现代,并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客家文化的基本景观具体表现为:

一是客家人的称呼和身份获得了全球性的统一。客家人由地域认同转向全球性的客家文化认同。历史上的客家人并不都是以“客家人”见称,如迁到江西修水的被称为怀远人,迁到奉新县的被称为归德人,迁到广西的被称为来人,迁到四川的被称为上广东人,迁到海南的则被称为一人,而迁于海外的,则称为赤溪人,嘉应州人,永定人,大埔人等等。今天,共同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使“客家人”的身份和称呼获得普遍的认同。作为全球客家人认同的重要载体是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定期举办,这是以发扬传统、扩大亲情、增进交流为宗旨的国际性民间联谊活动。该项联谊活动于1971年9月由香港崇正总会发起,每两年一届,轮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举行。至今已分别在香港、台北、旧金山、东北、曼谷、波累、高雄、沙巴、梅州、新加坡、吉隆坡、龙岩等城市共举办了十六届,历时30年;已成为国际性、制度化的全球客家人的民间文化活动。

二是客家人认同的客家文化进一步突出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内容和精神。历史上的客家人十分强烈地认同中原祖地,崇尚中华正统文化,以中华最高文化理想为依归,今天的客家人则进一步将中原正统观念转化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的认同,扩大华文教育,崇尚儒家伦理、弘扬大同理想、礼仪文化,等等。秉性维护传统成为客家民系的整体特征。

三是客家人寻根谒祖的意识和活动进一步加强。除了传统的祭祖敬宗的一套礼之外,客家人寻根谒祖范围有所扩大。包括对客家各种传统文化的体验成为寻根谒祖活动的重要内容。由于客家人秉性

维护传统,传统文化比较系统完整,许多文化事象都有享有国际声誉,如客家土楼就有可能进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客家山歌就和东北二人转、新疆阿凡提故事一起进入世界民间文化瑰宝的殿堂。在闽西、土楼居民博物馆、客家族谱馆、客家博物馆、定光古佛寺、客家公祠、客家母亲园,都成为客家人寻根谒祖追恩本水源的重要的物化依据。而欣赏客家山歌、舞蹈、曲艺等传统民间文艺则成为时尚。每年到闽西粤东寻根谒祖的客家人不下30万,这两地与世界上20多个国家100多个客属社团建立了经常性联系。

所以客家文化虽然不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但却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进入了现代的获得了新的认同,文化,而没有象其他文化一样消亡,在现代社会,客家文化作为一个民系的文化获得了保存和发展。

三、激进与保守相结合的现代文化创新机制分析

如前所述,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是全球的社会变迁大趋势,客家传统社会也无可避免地走向了现代社会,但客家传统文化却没有象其他传统文化一样消亡,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走向了现代,我们今天所体验到的客家文化已不完全是传统的客家文化,但我们仍然可以体会一种丰厚的传统,是一种由传统发展而来的客家文化而不是完全割裂了传统的外来文化。客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与其说被取代,毋宁说是客家文化传统对现代化作出的功能性适应和转化来得更确切,这就是客家传统文化现代化取向采取激进与保守相结合的实质所在。总的来说,是客家文化传统中吸收了市场化、工业化、民主化、科学化因素,并使原有的传统性的因素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如宗族组织的群体利益至上的原则转化为集体主义原则(港台则称为团队精神);之所以能够这样,在于客家传统中有兼容多元文化的机制,有吸收、传播、亲和其他优秀文化的机制,体现为固守传统又勇于开拓相结合,向外走、向外看的开放精神和珍惜文化传统相结合。总结客家文化传统接受外来文化的做法,我们可以发现,其可贵的地方在于不是被动地接受、被动地受人,而是吸收加以改造,从而使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能够兼容并互相促进,实现功能性适应和创造性转化。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

其一,区分人文价值的特殊性和现代化的普遍性,从“客家精神”这一价值观的高度来谋求客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协调性。所有的现代性因素都来源于西方,与客家文化传统并无渊源关系,这些现代性因素以科技为动力,具有推动现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普世价值,但是现代性因素只是为人类服务的手段和工具,而不是人文、人类社会的最高最后诉求和目标,各地区各民族都是自己的人文背景和精神价值标准,应有怎样的人文精神和价值来面对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西方人文却并非具有同质的普世价值。并非各地、民族适用。客家人从自身颠沛流离的迁移历史和冒险犯难的开拓精神中找到面向现代化的价值依据。这就是客家精神,这种精神是积极进取的,是改革创新,又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本内核的。从具体的器物制度角度来看,客家传统文化不可能比之先进,但是客家人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凝聚的价值观念都是积极进取的,这就成为客家文化面对汹涌而来的现代化浪潮有一个精神支柱,以适应科技为动力的现代化的普世性。因此,客家人既不是割裂传统全盘西化、欧化,也不是食古不化一味固守传统,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挖掘出积极价值体系即客家精神来接受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化,在“客家精神”之下兼容并收又推陈出新,关于客家精神是什么?一百多年来有很多具体的论述。有的称为特性,有的称为性格,有的称为精神,但其内容大同小异。罗香林先生认为,客家的特性有七个:其一为客家人各业的兼顾与人材的并蓄;其二为妇女的能力和地位;其三为勤劳与洁净;其四为好动与野心;其五为冒险与进取;其六为俭朴与质直;其七为刚愎与自用。^[7]胡文虎先生归纳为四条:“一为刻苦耐劳之精神;二为刚强弘毅之精神;三为勤勤创业之精神。四为团结奋斗之精神”^[8]。黄石华先生则认为:“惟我客家人,秉性维护传统,历经变乱艰难和流离转徙,因而养成刻苦耐劳、独立进取、刚强弘毅、冒险犯难,团结创造,和热爱自由及国家民族的精神。”^[9]尽管文字表述有所不同。但都是对客家历史和文化传统从价值观高度的概括。客家人是以客家精神而不是以西方基督教新教伦理精神来从事现代化的,这一点就使得客家民系在接受和从事各种现代化活动之中,都能使本身的文化传统融进去,实现各种功能性适应,创造性转化,使得客家人只要有条件环境,就会使伟大的中华文化传统通过现代化的形式来复兴,现代化只是客家

谋求大同理想、幸福安康生活的一种形式。世界客属历届恳亲大会几乎都把发扬“客家精神”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内容提出来。客家文化传统中的一些宝贵价值观的节俭、刻苦耐劳、孝顺和群体利益至上等美德仍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这些价值观帮助了客家人,使客家人得以生存并获得成功。

二是作为客家传统文化载体的客家宗族组织瓦解过程中,又通过建立社团的组织形式作为客家传统文化的向现代化转化的载体。在传统社会,客家传统文化活动基本上是在宗族内部进行,宗族成为客家文化的载体,即使客家人迁移到其他地区,也会在定居一段时间之后与原乡联系,在新居地重建客家宗族社会,使客家文化在新的居地薪火相传、绵延不息。移居海外的客家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环境下基本上成为受雇佣的劳动力,也已经没有重建宗族社会的条件。因此大多数人都通过地缘性和血缘性的会馆社团的社会组织聚合在一起,这些会馆社团通过设立华文学校、诊疗所、殡仪馆、坟场等,同时也为宗亲同乡提供经济援助、住宿、回乡服务和传统节日的聚会,在照顾客属华侨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会馆社团逐渐成为联络乡谊、传承文化及接受西方文化的主要载体,代替了宗族的功能。有的学者还认为,社团实际上还是培养现代企业家的学校^[10]。而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随着土地改革和工业化、城市进程的加快,作为传统宗族社会基础的族田和族产基本上都不存在了,宗族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瓦解。在瓦解过程中,客家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先是通过民间的文化工作者、民俗工作者、文艺团体和文博单位挖掘、整理,尔后也通过社团的组织形式得以传承。可以说,客家社团的兴起、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客家文化载体由宗族为承传载体的发展过程,也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在客家社团的发展历程中,大体上经历了由地缘性会馆向方言性会馆转化、区域性社团向跨地区乃至洲际性、全球性社团的转化进程。在18世纪和19世纪,客属社团基本上是以地缘性社团的形式出现,如嘉应会馆、增龙会馆、永大会馆、广汀会馆就是以嘉应州、增城县、龙川县、汀州府、龙岩州、永定县、大埔县,广东省等认同标志的地缘性会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这些会馆逐渐向地区性、全国性、洲际性的社团过渡,在地区性、全国性、洲际性的社团之下,较小的客属社团则成为团体会员,如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属下28个团体会员,马来西亚客属公会联合会有49个团体会员,印度尼西亚客属总公会有37个团体会员,而全球客家崇正总会联合总会的团体会员有100多个。以这些社团为基本对象,客家民系逐渐发展出了世界性的恳亲联谊活动,从而使客家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

三是努力使传统文化事象为现代化服务,成为现代化的资源和动力。在前面列举的客家民系对传统文化的激进和保守的事例中,几乎无一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这些事例又无一不可在客家传统社会中找到某些蓝本和踪迹,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比如罗芳伯创立的“兰芳公司”,其管理办法中很多实际上很多是客家传统宗族社会自治的模式,如“约法三章”作为公司的法纪:“犯重罪者,如命案、叛逆之类,斩首示众;其次,如争夺、打架之类,类似打藤条,坐脚罟(即坐牢);又其次,如口角是非之类,罚以红绸大烛”。明显是宗法制下的乡规民约。此外,实行寓兵于各行各业的做法,也是客家传统宗族组织的特色的演变。又据有关学者研究,太平天国的“两”的基层建置单位,也是闽粤桂客家的宗族单位演化而来的,所根据的蓝本是活生生的闽西粤东社会生活和客家聚落的族群结构,客家宗族平居炉井相望,战时卒伍成列的兵农合一的做法,被太平天国的领导所吸收。此外,太平天国的乡政制度实际上也是客家家庭形态为蓝本的,是“族长封建制”的推广之^[11]。而黄遵宪提倡“我手写我口”,推行“诗界革命”开创现代新诗创作更是直接取材于客家民谣、客家山歌,以民间歌手、艺人为师。

如果说以上所论还限于社会文化方面,那么今天我们运用现代化的手段保护和开发客家传统文化资源使之现代化服务更是不胜枚举。在闽西,明清时期形成的著名的“八大干”(长汀豆腐干、连城地瓜干、上杭萝卜干、永定菜干、武平猪胆干、宁化老鼠干、清流笋干、明溪肉脯干)系列中,经现代工艺开发后再放异彩,其中地瓜干已成为闽西一大产业,年产值达十亿多;客家土楼不仅有望进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而且以土楼为背景,以客家历史文化为素材的影视艺术作品推陈出新,魅力十足。在第十六届客属恳亲大会期间由青年作曲家刘 创作、著名的女指挥家郑小瑛指挥、厦门市爱乐乐团演奏的《土楼回想》大型交响乐,就是一部以客家历史文化为素材,以客家山歌为音乐基调

的交响诗篇，它把乡土情韵与现代音乐艺术有机地演绎在一起，产生了轰动效应。在这里，何谓传统性何谓现代性实际上已不容易区分，因为都为现代社会所接受，成为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

以上笔者从现代化的视角对客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作了一个初浅的探讨，试图勾勒出客家文化在现代化中的演变轨迹和现代风貌，由于资料把握不全面，也由于回避了许多重大事件影响的分析，与其说是探索，毋宁说是本人对客家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思考与构想。

主要参考文献：

- 1、葛文清《全球化、现代化视角中的客家与闽西》，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11月；
- 2、汪行福著《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
- 3、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
- 4、杜维明著《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2月。

注释：

- [1] [日本]山口县造著《客家与中国革命》内称：“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May S. ER-BAUGH,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Hakka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s a Hakka Enerprise;
- [2] 汪行福著《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第33页；
- [3] 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第172页；
- [4] 葛文清《全球化、现代化视角中的客家与闽西》，第184、200页；
- [5] 参见葛文清《全球化、现代化视角中的客家与闽西》引论，第一节，以往客家研究的回顾与分析；
- [6] 葛文清《客家文化21世纪走向之照察》，香港《中国评论》，2001年3月号；
- [7] 见罗香林著《客家研究导论》，第七章，客家的特征；
- [8] 《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胡文虎序言；香港，1950年11月；
- [9] 《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黄石华序言；香港，1971年11月；
- [10] [新加坡]梁纯菁《会馆对族群创业者的贡献》，第三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新加坡，1996年11月；
- [11] 王振忠《从客家文化背景看〈天朝田亩制度〉之由来》，《复旦学报》，1992年第3期。

作者为福建省龙岩市闽西客家联谊会代表，副研究员。